

# 日本侵略统治时期的日语“直接法”教学

——以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小学为例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东方语学院

金香兰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徐雄彬

**[摘要]** 语言教育是文化传播的手段,殖民地日语教育则是日本侵略者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东亚殖民视域下的日语教学法为主线,以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小学为例,分析了日本侵略统治时期日语教学的特征。通过研究发现,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殖民教育形成了一定规模,对殖民地的定位和日语教学法的采用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日本对各地区、各民族的统治政策不同,其所采用的教学法也相应地存在地域性和民族性差异。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小学,随着日本对朝鲜族的政策从控制到高度同化的变化过程中,日语教学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说明当时教学法不仅是实现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强行灌输殖民政策的一种体现。

**[关键词]** 东亚殖民地 朝鲜族小学 直接法 殖民教育

## 引言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日本侵占中国的台湾、东北以及朝鲜半岛等东亚地区,目的在于将这些地区变为日本永久的殖民地。而要在殖民地维持统治,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向殖民地人民渗透文化。这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只有让殖民地的人学会日语,才能使其了解日本文化及灌输日本人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殖民地的人们不懂日语,就无法了解日本,更不可能认同日本。因此语言教育成为了日本在殖民地渗透日本文化、进行文化殖民的基础和关键。

纵观日本侵略统治时期的日语教学,较为特

殊的是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的情况。这须从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开始说起。通过《朴茨茅斯条约》《日韩协约》等条约吞并朝鲜半岛以后,日本宣称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也属于其管辖范围,并罔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在吉林省延边地区非法设立朝鲜统监府的办事处,推行了对朝鲜族的殖民主义教育。其主要目的在于,在取缔朝鲜族的反日教育、控制东北地区朝鲜族社会的同时,将延边地区变为侵占东北全境的桥头堡。并且在1908年开办了第一所朝鲜族殖民学校,以此为开端,企图将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学校的日语教育划入东亚殖民统治的框架中,并力图使其与朝鲜半岛保持一致。

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日本虽在学校管理体制上使朝鲜族学校与伪满其他学校保持一致,但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法上还是基本沿用了朝鲜半岛的方式。因此,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学校的

奴化教育是朝鲜半岛和伪满洲国奴化教育的交叉点,也是日本在东亚进行教育侵略的缩影。

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因此,深谙此道的日本政府以尚处于人生观、爱国心形成时期的小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在东亚地区殖民地推广日语教育,并极力限制中学及其以上学校的设立;同时,为达到奴化目的,日本非常重视日语教学法,根据殖民地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法来实施教育。日语教学法在日语殖民教育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而纵观中日韩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东亚视域对这一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成果尚显不足,采用口述史研究方法的成果则更为匮乏。

因此,本论文着眼于日语教学法,将口述史研究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相结合,以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小学为例,通过与东亚其他民族学校的比较来考察日本在东亚地区推行日语教育的特征。

### 1 “直接法”在部分东亚殖民地的试用

19世纪中叶开始,朝鲜半岛的贫苦农民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大批迁入中国东北地区。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对朝鲜半岛侵略步伐的加紧,朝鲜半岛的抗日义兵、知识分子和贫困农民纷纷移居中国东北,以组建反日团体、创办学校等各种形式致力于反日运动。对此深感不安的日本于1907年8月,以“间岛(中国吉林省延边地区)所属问题尚未解决”“保护韩民”为借口,非法设立了“统监府间岛办事处”,并于次年开始了对朝鲜族的奴化教育。因殖民统治尚不稳固,日本未敢操之过急,借鉴其在中国台湾、朝鲜半岛推行奴化教育的经验,以培养东北地区朝鲜族的“亲日”感情为目的实施了日语教育。

这一时期,中国东北地区在日本控制下的朝鲜族学校(数量自1908年开办第一所朝鲜族小学以后不断增加,到了1928年,小学已达到73所,约占东北地区朝鲜族小学总数的10%<sup>[1]</sup>)日语教学使用“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外语教学法产

生于19世纪末的欧洲,此后受到了日本的语言学者们的重视。中国台湾地区是日本在殖民地推行“直接法”的第一试验点。日本侵占我国台湾以后,起初采用传统的“翻译法”进行殖民教育,主要针对15-30岁的成年人进行日语教学;自1898年开设公学校(普通小学)以来,入学者的年龄变为8-14岁,该年龄段的儿童尚未完全掌握母语。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日语教育的“旗手”山口喜一郎(1872-1952)探索出了以“古安法”为基础的“山口直接法”。他认为,此“直接法”具有“皇国精神基因”,强调通过直觉感知语言,排除母语和翻译,要求日语和具体事物直接联系起来,直接用日语思考,尤其重视日语学习与实际生活的结合<sup>[2]</sup>。称山口为殖民地日语教育的“旗手”,委实毫不夸张。他曾向日本社会公开呼吁:在东亚确立“共荣圈”是“现代日本人的第一要义”,把日语作为“东亚通用语”“普及日语、振兴日语教育”是每一个日本人必须为之努力的事情<sup>[3]</sup>。具有“行动力”和“魄力”的山口于“日韩合并”(1910年)后的第二年,又奔赴朝鲜半岛继续探索和完善他的“直接法”。可以说,借鉴了台湾经验的朝鲜半岛,是“直接法”的最佳实践之地。如,“直接法”提倡尽量不使用母语,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依然需要借用几句母语来解释。从借用母语的情况来看,朝鲜半岛明显比台湾少<sup>[4]</sup>。朝鲜语的发音、语法与日语相近是主要原因。

那么,日本所推行的“直接法”教学法具有哪些特点呢?山口喜一郎《日本語教学法原论》(新纪元社,1943)、久保田优子《殖民地朝鲜的日本語教育》(九州大学出版会,2005)、徐敏民《战前中国的日本語教育》(エムテイ,1996)、蔡茂丰《台湾的日语教育史研究(上)》(大新书房,2003)等众多前期研究中,均有涉及到日本殖民地、侵占地的日语教育及“直接法”。从整体上来看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用日语教授日语。为了方便学生理解,常利用日常生活中儿童较为熟悉和喜欢的实物、图画以及动作来教授,以此将日语教育和儿童的

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提高学生对日语的理解能力及学习日语的积极性;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日语语感和会话能力。例如,基于山口“直接法”精神编撰的《普通学校国语读本》(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朝鲜族学校使用),课文主要由对话或与生动插图结合的简单明了的日文构成,无需朝鲜语解释。此类教学内容常在与他人相互交流时,或其他具体的情景中进行,既有利于学生较快掌握日语语感,也有利于学生较快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精神”;其三,教材的词汇中名词所占比例高,多使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动词,但副词、接续词、形容词等复杂词汇出现频率较少,这不利于学生掌握高层次的学习能力。显然,这种“直接法”有利于培养会说日常日语但不具备较强思维能力的“顺民”。

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学校也推广了上述“直接法”。如,1908年“间岛普通学校(小学)”设立时,对当时还未升为“国语”的日语课,日本对其教学法作了如下规定:“学习外语时,不用本国语,直接用外语学习各种事物效果最好……如果将日语逐一翻译成朝鲜语,学生们会感到枯燥,还会在脑海中不断思考事物、朝鲜语、日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无法迅速理解日语、灵活使用日语(笔者译,后同)”。还规定主要对低年级采用“直接法”教学<sup>[5]</sup>。因为低年级的教学内容主要为名词、动词和简单的语句等,比较容易利用实物、动作帮助学生理解;而在高年级的教学中,抽象的词汇和复杂的句子较多,较难使用“直接法”教学。因此,若想在高年级的教学中采用“直接法”,则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日语水平、较强的表达能力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对学生的日语水平也有较高的要求。

日本在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的日语教育中极力推广“直接法”,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学校只对低年级推广“直接法”,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东北地区的条件还未成熟。与朝鲜半岛相比,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学校具有以下“不足”:第一,日本教师少。日本在殖民地迅速推广日语教育的

时期,日本教师长期处于不足状态,此时,在向殖民地派遣日本教师时,日本自然首先考虑时已完全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而中国东北地区当时尚未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一方面不敢向此地大规模地派遣日本教师,另一方面也会更倾向于满足朝鲜半岛的日本教师需求。如,1915年朝鲜半岛“普通学校(小学)”的教师中日本教师约占三分之一(久保田优子,2005);而同一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直接经营的“普通学校”中,每所学校最多只有一名日本教师(金琰实,2014),显然少于朝鲜半岛。在设立补助学校(日本提供补贴的学校)时,因日语教师不足,日本派遣了部分朝鲜族“普通学校”的毕业生作为教师<sup>[6]</sup>,其水平就可想而知了;第二,朝鲜半岛设有师范学校、专业学校、研究科、大学及教师培训机构<sup>[7]</sup>,而中国东北地区并未针对朝鲜族设立这类学校,不利于教师培养;第三,缺乏使用日语的环境。日本虽在朝鲜半岛大规模地推广日语教育,但因时间过短,日语的普及率依然不高,就连大部分朝鲜人日语教师也难以只用日语授课。因此,日本在针对朝鲜教师编写的《教育学教科书》(教师用书)中规定:“尽量利用实物、动作、绘画、模型等使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实在无法用日语说明时,也允许使用朝鲜语”(久保田优子,2005:301)。虽然朝鲜半岛的日语普及率“并不理想”,但其普及程度依然高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社会。因此,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学校的日语推广力度和师资力量均不及朝鲜半岛。

## 2 “东亚新秩序”下“直接法”的全面推广

“七·七”事变后,随着侵占地的扩大和稳定,“日语向大陆扩张”成为日本许多国语学者(日本籍的日本语学研究者在日本被称为“国语学者”)的口号及“使命”。日本于1938年11月3日提出了由其主导的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声明<sup>[8]</sup>。此后,“日语东亚扩张论”像洪水般涌来。当时日本语言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的西尾实(1889-1979)提出了较

具代表性的观点：“大东亚战争的实质是思想战，这场思想战的尖兵为语言，而其后方阵地也是语言。大东亚战争胜利的重点在于将日语渗透、普及到大东亚全域”<sup>[9]</sup>。该观点充分体现出日本侵略统治下日语教学被作为其侵略手段来定位的史实。

日语被捧上“神坛”后，随之而来的是在日本的侵占地、殖民地如何有效地实施日语教育的问题。1941年4月，为响应日本政府把日语作为“东亚通用语”这一口号，日本东亚文化侵略机构“日语教育振兴会”创办了机关杂志《日本语》，它标志着日本政府已开始面向东亚，尤其是面向中国展开全面而系统的日语普及计划。这一时期，日语教学法也开始受到日本学界、教育界和伪政府的关注，关于日语教学法的论战此起彼伏。如，在杂志《日本语》中，教学法各派常发表文章唇枪舌战。其中“直接法”教学法因在殖民地已“扎根”30余年，属于“资格老”“底蕴充足”的教学法，虽然存在不少缺陷，但依然成为论战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教学法。

在日本全面侵华这一历史时期，有必要将伪

满洲国、“关东州(泛指当时中国大连地区)”、中国华北等地区的日语教育及教学法也纳入视域中进行考察(见表1)，以此从宏观视角分析出日本在东亚地区推广的日语教学法的特点。

首先考察伪满洲国汉族学校的日语教学法。在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取得“显赫成就”的“直接法”虽辗转来到了中国东北，但在东北却显得“水土不服”。关于其原因，我国日语教学法研究学者边家胜提出了两点<sup>[10]</sup>：其一，日语教学环境和学习对象发生了变化。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与朝鲜半岛推行“皇民化”运动和“常用国语”运动，将日语定为日常生活使用的“国语”，日语课被称为“国语”课，学习者使用的教科书与日本本土学生一致，废除台湾语(汉语)课和朝鲜语课，强制要求其他学科授课均使用日语。学习者从很小开始就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日语。而在伪满洲国，日本将日语课作为汉语课的对立面强制开设，学习者多为成人，学习时间短暂；其二，日语师资情况不同。在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的学校中，除中国的日语教师和朝鲜的日语教师之外，还有许多日本

表1 “直接法”在日本殖民地、侵占地的“适应”

日语课的性质	地区	采用“直接法”的程度及效果	原因
“国语”	中国台湾	程度较高	发展落后，接受日本的“先进性”；师资力量较强(日本人多)；取消母语课、将日语定为日常生活使用语。因朝鲜语的发音、语法等类似于日语，在朝鲜半岛能够采用程度更高的“直接法”
	朝鲜半岛	程度很高	
“国语之一”	伪满洲国	“水土不服”	汉、满等民族对日语的抵抗心较强；日本教师少、中国教师的日语水平低；汉语课依然存在、日语不是多数人的日常用语
外国语	“关东州” 汉族学校	程度不高	教育方针不明确；民众对日语具有排斥心理；汉语课依然存在、日语不是多数人的常用语言
	中国华北	受挫	民众对日语具有强烈的抵抗心；日语的课时量少、日语的使用“走不出课堂”；其余的课都用汉语授课

注：表格根据以下资料整理而成：山口喜一郎. 日本語教授法原論[M]. 東京：新紀元社，1943；김순진의 일제강점기 일본어 교과서「国語読本」을 통해 본 식민지 조선 만들기[M]. 서울：제이앤씨，2012：205-299；久保田優子. 植民地朝鮮の日本語教育[M]. 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2005：282-298；徐敏民. 戦前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M]. 東京：エムティ，1996：82-95、165-176、245-260；蔡茂豊.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上)[M]. 台北：大新書房，2003：149-200。

教师,这些师资力量成为当时开展“直接法”教学的保障。然而在伪满地区,1933年前后,由于许多日本教师主要在公学堂(小学)或中学从事日语教学工作,因此在这些学校,山口的“直接法”能得到很好的推行;但是许多日语能力较好的中国教师却转行成为伪满洲国所谓的“官员”,此举削弱了一般学校使用“直接法”进行日语教学的师资。当时日语界泰斗级人物、教学法研究专家大出正笃对于伪满洲国的日语教育表示“极为失望”,称“看不到未来”。他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懂日语教学法的汉族教师成为了教师队伍的主力<sup>[1]</sup>。这表明“直接法”的实施与教师队伍有着较大的关系。

华北地区的日语教育始于清末,“九·一八”事变前,日语教育一直没能受到重视。在诸外语学习顺序的排名中,英语是第一外国语,第二是德语或法语,而邻国日本的语言则被排在第三或更后<sup>[2]</sup>。学习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阅读日文书学习西方文明及技术。在日语教学中采用的是“翻译法”,即基于“三分科主义”将语法、阅读、会话明确划分,更重视语法和阅读<sup>[3]</sup>。“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的日语教育开始采用“直接法”,但未能彻底渗透到日语教学中(徐敏民,1996:245)。为什么“直接法”在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尚可立足,却在华北遭遇挫折了呢?究其原因,可列出以下两点:第一,华北地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中心之一,民众的文化程度高、民族凝聚力强,因此作为愚民、奴化工具的日语很难立足<sup>[4]</sup>;第二,在华北地区,日语的课时没有像台湾地区那样大量增加。据1938年8月华北地区小学的课时量来看,一、二年级未设日语课,三、四、五、六年级的日语课在总课时量中占比为4.7%、4.5%、6.0%、6.0%,而同一时期中国台湾、朝鲜半岛的比例为40%以上,差距悬殊<sup>[5]</sup>,因此,须以大量课时支撑的“直接法”难以在华北地区产生效果。

与在华北地区相同,日语在“关东州”也被设为外国语,但情况较为特殊。19世纪末,我国东北地区最南端面积不大的一小块地区成为了日本的

租借地,称作“关东州”。日本在此加强了殖民统治。虽然日本在该地区采用了“直接法”,并以“台湾的方式”“朝鲜半岛的方式”强化了日语教育,但“关东州”毕竟是租借地,奴化力度不能太露骨,因此教育方针也不甚明确。1944年,时任旅顺高等公学校学监大石初太郎也哀叹:“多年来,此地的教育目标甚不明确,使人担忧,这影响着我们的勇气和决心。对于非皇国臣民、非‘满洲国’国民、非‘支那人’的‘关东州’人,该以怎样的方针教育为好呢?再者,从民族身份上看,他们又属于汉民族,所以问题变得更复杂,因此始终未能形成一个明确的教育方针”(石刚,2003:81-82)。以上,诸如方针不明确、汉语课依然存在以及日语未能成为多数人的日常用语等因素,使得“关东州”的日语教育成为不全面的“台湾式教育”,日语普及率也远远低于中国台湾地区。

考察上述日本殖民地、侵占地的日语教学法发现,“直接法”在不同地区的“适应”程度也有所不同。在日语成为“国语”的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直接法”的采用程度比较高;在日语成为“国语”之一的伪满洲国汉族学校,则显得“水土不服”;在日语成为外国语的“关东州”、华北等地区,“适应”程度不高或受挫。总的来看,在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区的汉族学校中,“直接法”的采用“并不理想”。

那么,同属伪满洲国殖民统治的朝鲜族学校,其“适应”状况如何呢?目前为止,通过课题组成员对约760名该时期殖民教育亲历者的采访,以及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研究专家齐红深历经30余年对殖民教育亲历者的追踪调查,在学校管理体制、教师构成、教育方针、课程大纲、课程表、学生的毕业去向、日语教科书和教师教学用书、伪满洲国政府、日本领事馆、关东军、满铁、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兴亚院”、日语教育振兴会的相关史料分析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积累,从这些考察中可以看出,“直接法”在朝鲜族学校比在汉族学校渗透得更深。在这一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各类学

校中,只有朝鲜族学校出现了师生在课堂使用日语、在校园里只说日语的局面。与汉族学校相比,朝鲜族学校具备了以下条件,使“直接法”较为容易渗透。

第一,对于朝鲜族教育,日本创造出了“直接法”可立足的环境。展开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在朝鲜族小学实施日语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将朝鲜族学生培养成战争所需的“人才”,即“未来的皇军”和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的人。为避免朝鲜族产生“二心”,日本对朝鲜族实施了高度的“皇民化”教育,具体措施包括“创氏改名”(将朝鲜族学生的名字改成日本式名字)、禁用朝鲜语,以及“国语”(日语)教育的加强等,这些是日本将朝鲜族改变为“日本人”的有力措施,也是“直接法”在朝鲜族学校能够深入扎根的重要外部条件。日本在将朝鲜族小学的学校生活“日本化”“日语化”的同时,还在“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方针下,千方百计地将朝鲜族群体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群体分开,甚至造出朝鲜族“集团部落”,使朝鲜族集中在一起生活。在这种被割开的朝鲜族“空间”里,日本推行“常用国语”运动,放学后朝鲜族儿童玩耍时说日语已成为常态,更有不少儿童入学前就已会说简单的日语。

第二,朝鲜族学校的教育方针、课程设置及教材与“直接法”相配套。日本对朝鲜族的教育目标是将其培养成“皇国臣民”,为实现此目标,日本将有利于培养“国民性”的“直接法”作为教学法,教材也按照“直接法精神”编写(久保田优子,2005:283)。在实施高度“皇民化”政策之前,日本虽在朝鲜族小学提倡采用“直接法”,但实际上针对的只是小学低年级;而在高度“皇民化”时期,则针对所有年级采用了“直接法”,不允许师生在课堂上说任何一句朝鲜语,可以说这一时期实施的是极端的“直接法”。这种“直接法”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去教学、练习,因此朝鲜族小学的日语课时量远远超过同一时期伪满洲国汉族学校的日语课时量。

第三,朝鲜族学校教师队伍人手较为充足:1)朝鲜族学校的日本人教师较汉族学校多。据笔者对朝鲜族殖民教育亲历者(96名)的口述调查发现,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伪满洲国的大部分朝鲜族小学中,学校的领导和核心力量均为日本人,日本教师已成为学校的掌控者;而在伪满洲国日语教育达到顶峰期的1943年,其5万名小学教师中日本教师只占2%<sup>[6]</sup>,东北地区广大农村的许多汉族学校都没有日本教师,日本教师所占比例远远少于朝鲜族学校;2)大部分朝鲜族教师均出身于朝鲜半岛的大学或师范学校,毕业后即被派来教书,对“直接法”比较熟悉;3)东北地区自日本对朝鲜族实施奴化教育以来,一直采用的是“直接法”,因此本土出身的教师也对“直接法”十分了解。

第四,朝鲜语、日语同属黏着语。与汉语相比,朝鲜族人学习日语更为便利。该项如前述,兹不赘述。

那么,与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学校相比,朝鲜半岛的学校情况如何呢?笔者认为,虽然东北地区朝鲜族学校的教育内容、教学法等与朝鲜半岛的学校十分相似,但从教师队伍和殖民空间这两个要素来考察,能推测出“直接法”在朝鲜半岛实施得更彻底,其原因如下:1)朝鲜半岛的学校拥有更多高水平的日语教师。这一时期,日本在朝鲜半岛通过大学、师范学校及“教师养成所”等培养了一大批日语教师,但对于培养出来的“人才”,首先考虑“为自己所用”。虽然有不少日本教师和朝鲜教师从朝鲜半岛被派往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学校,但大都年纪尚轻、经验不足。经验丰富,水平过硬的教师依然留在朝鲜半岛。仅从日本教师的比例来看,便能得知日本更重视对“完整的殖民地”朝鲜半岛的人民的奴化。如1936年在伪满洲国日方直接经营或提供补贴的朝鲜族学校中日本教师所占比为14%,低于21年前(1915年)朝鲜半岛的公立普通学校日本教师的比例29.1%<sup>[7]</sup>。2)与朝鲜半岛的殖民空间相比,伪满洲国的殖民空

间显得有点“松散”。对于伪满洲国,日本无法像对朝鲜半岛那样实施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虽然企图通过“分而治之”的政策隔断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但未能完全将东北朝鲜族孤立化。而封闭、严密的朝鲜半岛殖民空间,则有利于“直接法”的推广。

### 3 “直接法”所产生的效果

教育活动是在受教育者——学生身上产生作用的,所以学生讲述自己所见、所闻、所知、所感的口述史料是揭露日语殖民教育效果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故在此基于日语殖民教育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分析“直接法”的效果。分析时,与东北地区朝鲜族小学处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殖民空间的伪满洲国汉族小学进行比较。

从前面1、2节的分析中能看出,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学校采用的是“直接法”教学法,但在殖民的初始阶段因条件尚未成熟,只能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并用的教学法。而展开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根据对朝鲜族实施的高度“皇民化”政策,教学法也变为了赤裸裸的“直接法”,即禁用朝鲜语的同时将日语变为学校的唯一用语,并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日语。这一变化对朝鲜族小学生的伤害是巨大的。例如,2014年2月13日,徐雄彬在沈阳市西塔教会采访的殖民教育亲历者吴爱恩(朝鲜族)如下讲述了自己当时的苦恼:

我念小学(抚顺的清原县朝鲜族学校)的1930年代,在学校还可以说朝鲜语,但之后情况就变了。学校要求学生必须说日语,禁止说朝鲜语。如果学生说一句朝鲜语,就遭到挨打、罚站、打扫厕所等惩罚。为了避免自己打扫厕所,学生们会互相揭发对方。小学生一般在家说的是朝鲜语,在学校说日语时一不小心就会说出朝鲜语。为了避免“失误”,学生慢慢地说日语,那是心惊胆跳的事。说朝鲜语被发现挨打的时候,

教师不分男生女生狠狠地打学生的手心,直到手心变红。上课迟到的话,一般被罚站。在家里,我父亲不允许我说日语,说日语是日本鬼子的语言,如果说一句日语,父亲就会大发雷霆。其实,因为上学的事,家里也很矛盾,孩子不念书也不行啊。在学校呢,只要说一句朝鲜语就遭惩罚,我不管在家还是在学校都战战兢兢的,那是一段痛苦的岁月啊。……1945年初,日伪当局命令日本人学校、朝鲜族学校、汉族学校等各个民族学校的师生集合在一起搞军训。汉族学校的学生们听不明白口令,可能是他们日语水平低,所以做错动作的较多。因此遭到日本人的打骂。(《吴爱恩口述档案》,2014:1-2)

可见,语言环境的大变给朝鲜族小学生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学校强求说日语,禁止使用朝鲜语;而父母又对此感到反感。可想而知学生被夹在中间的痛苦。在朝鲜族小学,日本规定课堂和课间休息时间师生须用日语,只要说一句朝鲜语就遭到惩罚。这种教学模式和语言环境导致两种效果,即朝鲜族学生的日语语感和日语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朝鲜语水平迅速下降,最终将朝鲜族学生变为“皇民”。在各民族小学学生集合在一起军训时,这种语言学习的效果尤为明显,与朝鲜族学生相比,汉族学生听不懂日本教官口令的情况明显更多。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朝鲜族小学的日语教育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教育,而是通过日语向学生灌输“皇道思想”的教育。例如,日语教科书中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是与天皇制教育、战争教育相关的内容,教科书中的教师和学生均以军人的形象出现。而同一时期伪满洲国汉族小学的日语教科书中,这些内容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明显少于朝鲜族小学。

这种对朝鲜族小学生的高度同化政策,对学生此后的人生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曾经就读于伪间岛省立延吉工业学校的黄南

翼老人于2014年4月12日接受笔者采访时口述如下:

伪间岛省立延吉工业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朝鲜族,其他民族有两个汉族学生和一个白俄罗斯学生。那两个汉族学生日语说得不好,他俩之前念的是汉族小学。当时,在延边地区朝鲜族学生的日语口语水平普遍高于汉族学生。这与日本在朝鲜族学校更加赤裸裸地推行日语教育有关,因为当时朝鲜族被称为“日本帝国臣民”,因此日本更重视对朝鲜族的日语教育。日本在汉族学校,如我们当地的汉族小学——铜佛寺官立学校,没有像朝鲜族小学那样高强度地推行日语教育。

(《黄南翼口述档案》,2014:1-2)

在这种语言环境之下,朝鲜族社会畸形发展,出现了如一些教师和学生忘记母语朝鲜语等现象。因为在日本眼中朝鲜族是“日本人”,所以对其实行的日语教育的程度也高于伪满洲国的其他被统治民族学校。

上述日语教育的效果,均出自接受了日本侵略统治下的日语教育的朝鲜族人士。我们也有必要听听汉族殖民教育亲历者对当时日语教育的看法。谷学谦(男,汉族,1925年12月出生于辽宁省,为东北师范大学日语系的创立及其后硕士研究生点的开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小学时代因父亲工作原因,曾就读于辽宁省普兰店、长春、日本东京、朝鲜半岛等多个地区的小学,中学时代曾就读于朝鲜半岛及长春的中学,此后于伪建国大学深造学习,因此对于日本东亚的殖民地、侵占地日语教育了解颇深。据他的回忆,其眼中的日本殖民地日语教育以及朝鲜族学校的日语教育具有以下特点(采访人:徐雄彬;采集时间:2015年9月、2016年7月、2017年6月,共采访7次;地点:在谷学谦老人的家、他家附近的公园):

……关于伪满各民族学校的日语教育,朝

鲜族学校的日语教育采用的是“直接法”教学,而在汉族学校采用的是“翻译法”教学,就是说在汉族学校日语教师一般用汉语教日语。听说,在朝鲜族学校禁止学生说朝鲜语,而在汉族学校学生可以说母语。“直接法”需要教师有非常高的日语水平,一般中国籍教师用不了“直接法”。朝鲜族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日语水平比较高,他们能用“直接法”教学。

(《谷学谦口述档案》,2017:8-9)

谷学谦以其切身经历,审视日本对殖民地统治,对于不同地区的日语教育进行了比较。从其回忆中能看出,日本对其彻底的殖民地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和表面上作为“独立国家”的伪满洲国的日语教育政策不一样,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的统治更为赤裸裸,殖民空间也更让人窒息。而在伪满洲国,朝鲜族学校的日语教学法不同于汉族学校,日语教育程度高于汉族学校,这与朝鲜族殖民教育亲历者的证言基本吻合。(中国朝鲜民族教育史料集,2002:130)

令人费解的是,虽在同一个伪满洲国殖民地,日本对于朝鲜族的日语教育政策又不同于汉族等其他民族学校。完全按照伪满洲国的日语教育方针奴化朝鲜族在管理上不是更方便吗?为何在伪满洲国教育的外壳下,还是按照朝鲜半岛的教育内容将东北地区朝鲜族作为“日本人”培养呢?显然,对于日本来说,朝鲜族具有特殊的利用价值,这与日本对不同地区殖民地的定位相关。在日本的战略中,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和伪满洲国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例如,1942年,时任工商大臣的岸信介公然宣称:“将朝鲜、台湾作为皇国的一部分来考虑”,而伪满洲国并不属于“内地化”的对象<sup>[18]</sup>。梳理近代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史会发现,实际上当时日本将殖民地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层为“日本化”程度较高的朝鲜半岛、中国台湾、桦太等地区;第二层为伪满洲国、伪蒙疆以及东南亚诸多侵占地区。当然,这些不同层次殖民地的战时“义

务”也不同。在伪满洲国等殖民地,日本的目标是维持殖民统治秩序,将其作为战争的大后方。而在朝鲜半岛、中国台湾等地区的目标则是解决兵源问题及掠夺战争所需物资,因此这些地方更像前线。随着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日军的兵力消耗大增,朝鲜半岛、中国台湾等完全丧失主权的殖民地的青壮年成为解决“皇军”兵源的对象之一。但是,日本对这些殖民地出身的士兵心存疑虑,为了让这些士兵彻底丧失自民族的主体性并全心全意地冲上战场,日本便推行了激进的、高度的所谓“皇民化”运动。而生活在伪满洲国的“皇民”朝鲜族一直被日本定性为“朝鲜半岛的一部分”“朝鲜半岛的延长线”,自然也被纳入这个圈子中。为了使伪满洲国的朝鲜族彻底“日本人化”并为侵华战争服务,日本把在朝鲜半岛为战时总动员而实施的“内鲜一体”(“内”指日本,“鲜”指朝鲜半岛)政策也纳入到伪满洲国的朝鲜族社会,强调朝鲜族作为“皇民”的身份和应履行的“义务”。在此政策之下,日本对东北地区朝鲜族进行“创氏改名”(改成日本式名字),实施战时体制下的教育,并制定和实施了征兵制。

#### 4 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日本在东亚各殖民地所采用的日语教学法与其对殖民地的定位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即:日本对各地区、各民族的统治政策不同,其所采用的教学法也相应地存在地域性和民族性差异。这说明日本当时推行的日语教育是其对殖民地实施文化殖民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从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小学所采用的日语教学法,即“直接法”的变迁中也可以看出,在同一个殖民地,对同一个民族的日语教学方式也随着统治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如,从1907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的主要统治目标仅停留在

对其加以控制,加之这一时期日语在朝鲜族社会的普及率较低,因此在朝鲜族小学采用的“直接法”的程度并不高。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对朝鲜族推行了高度“皇民化”政策,对朝鲜族学生的培养目标也变为将学生培养成战争所需的“人才”“未来的皇军”。为了实现这一时期的统治目标,将朝鲜族彻底变为“日本人”,日本采用了极端的“直接法”,并在此基础上禁用了朝鲜语。

研究、了解历史固然重要,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目前美化殖民主义的世界性思潮的抬头。提到美化日本侵华历史,人们自然想到日本右翼群体。但这不仅仅是日本右翼的问题。例如,进入21世纪以后,美化欧洲殖民主义的思潮在西方世界有了明显增长;在日本,以右翼势力为核心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较为明显;近年来,在学界也出现了强调殖民主义“积极方面”的倾向,部分学者甚至误用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破坏”和“建设”)论,呼吁应该肯定日本侵华时期所谓的“积极”一面。并赞美日本侵略统治中国东北时期做出的城市设计、铁路修建、水利设备、医疗和教育体系等,竟然将其看作“建设性力量”。这些过度的表述在客观上与欧美、日本的殖民主义美化论形成了某种“共鸣”。马克思在1853年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提出了“双重使命”,但他严格区分了资产阶级在本国和殖民地所起的作用:“在本国破坏旧的封建制度的同时建设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它在殖民地仅仅破坏了一个旧的社会,而没有随之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新社会,将殖民地变为始终听令于殖民者的畸形社会”。他称“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这就使印度人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剧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sup>[19]</sup>。

包括殖民教育在内,日本侵略者给东亚殖民

地人民带来的只有灾难。侵略者所到之处强行移植日本文化和军国主义,使殖民地人民变为日本的奴隶。这违背了文明发展的规律,扼杀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它的脉络和延续性,即便是借鉴他国的先进文明,也应根据自身的意愿、特点来决定。毫无疑问,日本强制推行的奴化

教育,极大地破坏了东亚各国、各地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日语教育与‘皇民’驯化——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族的文化殖民”(项目批号:15YJC740112)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徐雄彬;2019年度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基于口述史料的伪满中学日语教育与文化殖民研究”(项目批号:JJ-KH20190387SK)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金香兰]

## 注

- [1] 许青善等.中国朝鲜民族教育史料集(第二卷)[M].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2002:130.
- [2] 山口喜一郎.日本語教授法原論[M].東京:新紀元社,1943:127.
- [3] 山口喜一郎.北支に於ける日本語教育の特殊性[J].日本語:第1卷第2号,1941:10.
- [4] 久保田優子.植民地朝鮮の日本語教育[M].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2005:290.
- [5] 金斑実.満州間島地域の朝鮮民族と日本語[M].福岡:花書院,2014:54-55.
- [6] 川口柳橘.間島書堂調査書[R].1914年12月.
- [7] 鄭在哲.日帝時代の韓国教育史[M].佐野通夫,訳.東京:皓星社,2014:343.
- [8]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M].東京:原書房,1978:401.
- [9] 西尾実.日本語総力戦体制の樹立[J].日本語:第3卷第1号,1942:20.
- [10] 边家胜,姜巧.日语直接法教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历程[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5(6):104.
- [11] 石剛.植民地支配と日本語[M].東京:三元社,2003:78.
- [12] 太田宇之助.中華民国に於ける日本語[J].国語文化講座:第6卷,1942:150.
- [13] 国語教育学会.標準語と国語教育[M].東京:岩波書店,1940:399.
- [14] 渡辺正文.外地における日本語教授法の変遷[J].日本語教育:第13号,1969:47-48.
- [15] 在北京日本大使館文化科.北支に於ける文化の現状(報告書)[R].1943:60-61.
- [16] 国語文化学会編.外地・大陸・南方日本語教授実践[M].国語文化研究所,1943:183.
- [17] 朝鮮総督府内務部学務局.朝鮮教育要覽[M].朝鮮総督府,1915:36-37.
- [18] 磯田一雄.在滿日本人教育におけ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論—「滿洲郷土論」の意味を中心に[J].東アジア研究:第45号,2006:51.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761-762.

## 参考文献

- 齐红深.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 徐敏民.戦前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M].東京:エムティ,1996.
-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M].東京:岩波書店,1996.
- 蔡茂丰.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上・下)[M].台北:大新書房,2003.
- 천경화.한국인민족교육운동사연구[M].서울:백산출판사,1993(千敬化.韩国人民族教育运动史研究[M].首尔:白山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金香兰(1980—) 女 朝鲜族 吉林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教育研究

联系方式:E-mail:junzilan619@163.com

作者简介:徐雄彬(1978—) 男 朝鲜族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研究

联系方式:E-mail:xuxiongbin2014@163.com

## Japanese "Direct Method" Teaching during Japanese Aggression——Taking Korean Primary Schools in Northeast China as an Example

**Abstract:** Language education is a mean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while colonial Japanese education was an important way for Japanese invaders to carry out cultural colonization. Based on the Japanese teaching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n colonization and taking Korean primary schools in northeast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teaching during Japan's invasion and rule. Through th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Japan's colonial education in East Asia formed a certain scale, and there is a clos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ositioning of the colony and the adoption of Japanese teaching methods. Japan's governing policies towards different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were different,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adopted by Japan also had regional and national differences accordingly. In Korean primary schools in northeast China, Japanese teaching methods also changed as Japan's policy towards Korean nationality changed from control to high assimilation. This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method at that time wa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urpose, but also an embodiment of the forced indoctrination of colonial policies.

**Keywords:** East Asian colonies; Korean primary schools; direct method; colonial education

### Authors' Information:

Jin Xianglan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0

Associate Professor at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ail: junzilan619@163.com

Xu Xiongbin (Male) Year of Birth: 1978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ail: xuxiongbin2014@163.com

### 新版书目

书名	书号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新完全掌握日语能力考试N4级阅读	9787561956441	田代瞳等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20.7
新完全掌握日语能力考试N4级听力	9787561956434	中村香织等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20.7
BJT 商务日语能力考试听力听读解篇	9787561956649	濑川由美等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20.8
BJT 商务日语能力考试阅读篇	9787561956625	濑川由美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20.8